

长征的故事

中 流 砥 柱

陈 思 编著

5401
/ 24

知 识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了长征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任弼时等红军领袖的故事。书中既有对他们与优势敌人斗智斗勇的雄才大略的描写，又有对他们团结奋斗、与战士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动人场面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到处于劣势的红军之所以能战胜优势敌人、取得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本书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读物。

目 录

一、挽狂澜于既倒

巧借道·····	(1)
通道转兵·····	(6)
毛泽东力挽狂澜·····	(9)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	(13)
张闻天“立了大功”·····	(16)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	(21)
朱毛红军·····	(24)
毛泽东成为领袖·····	(29)
博古的襟怀·····	(31)

二、毛泽东用兵如神

随机应变·····	(35)
出奇制胜·····	(40)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45)
神出鬼没·····	(47)
调虎离山·····	(50)
声东击西·····	(53)
跳出围堵圈·····	(56)
毛泽东批林彪·····	(60)

三、大智大勇

红军不是石达开·····	(63)
--------------	------

毛泽东智斗张国焘	(68)
临危不惧	(72)
朱德岿然不动	(75)
任弼时大义凛然	(79)

四、同甘共苦

朱老总披挂亲征	(84)
毛泽东的毛线衣	(88)
特殊的草鞋	(91)
毛泽东、周恩来过雪山	(95)
一条马肉	(98)
胡昌保舍身救主席	(102)
领袖与战士	(106)
毛泽东打雨伞	(109)
周恩来长征二三事	(113)
周恩来过草地	(117)
一副腊羊架子	(121)
红军父亲	(124)

五、开创新局面

砍“尾巴”	(128)
“要的是歼灭战”	(130)
毛泽东挽救刘志丹	(135)
团结张学良、杨虎城	(138)
讨伐阎锡山	(142)
西征甘宁	(145)
三军大会师	(149)
山城堡大捷	(152)

一、挽狂澜于既倒

巧 借 道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蒋介石闻讯，急令他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拼命追击，又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广西军阀李宗仁及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西进的路上，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防守。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一手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排斥出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长征开始时，毛泽东是最后被通知随主力转移的。但毛泽东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积极出谋划策，为红军突出重围而殚精竭虑。

为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找到了当时任粤赣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与他一同商量破敌之计。

他与何长工一起分析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围剿”红军，每次都让地方军阀参加，以达到他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地方军阀实力的目的；而各地军阀均想保存实力，称霸一方，广东军阀陈济棠便是如此，他曾3次通电反蒋，对蒋介石阳奉阴违，以图稳坐“南天王”宝座。

陈济棠一面故作姿态，摆出向红军进攻的架势，骗取蒋介石供应他饷械，暗地里却派人与红军联络，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陈济棠怕与红军作战，他几次派人与红军联系，后又派出了他的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为代表，与红军进行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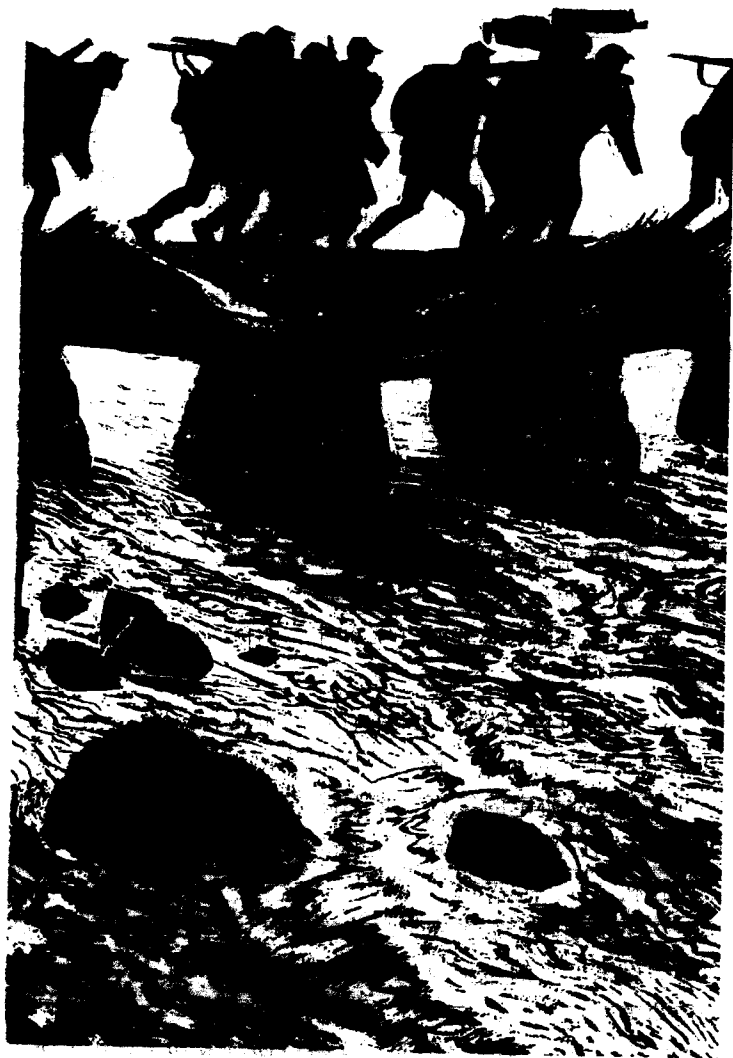
9、10月间，中央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去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

临行前，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行事。”

出发时，朱德总司令又给敌师长写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



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何长工、潘汉年启程前往白区。粤军派了一个连前来迎接，其连长一见何长工的面，便悄悄地对他说：“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了保密，何长工、潘汉年坐上粤军的花轿，来到了寻乌县的一个寂静的山村，住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里。第二天，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开始秘密谈判，谈判持续了三昼夜，达成了五项协议：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 必要时可以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个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一战线策略的巨大胜利。

在谈判期间，红军主力已决定转移，何长工、潘汉年接到了周恩来发来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军参谋长杨幼敏狐疑地问何长工：“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不露声色地回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

天了。”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立即返回根据地，前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结果。听完何长工、潘汉年的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说：“长工同志，你们辛苦了。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它对于红军突围转移，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主力，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修筑了许多碉堡。广东军阀陈济棠既想利用红军对抗蒋介石，又怕红军进入他的地盘。他将自己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集结待命，一旦发生战斗，可以机动；另一部分是分散的部队，驻在各地，虚张声势。这样既可以应付蒋介石，又可以避免与红军主力战斗，以保存实力。他派其第二纵队李杨敬部驻守会昌一带，派第三军第7师驻守筠门岭，以阻止红军南下进入广东。第一纵队各部分别驻守在信丰、安远、赣州到南康、安西一带。

由于红军已与陈济棠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便通知陈济棠，说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不知红军的虚实，遂按秘密协议，在红军进军方向，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

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于都下达了突围命令，红军分三路开始突围，沿途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红军突围途中，攻占了新田、古陂等城镇，击溃和消灭了敌人几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批军衣和弹药，补充了军队。战士们高兴地唱道：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新田古陂打胜仗。

通道转兵

中央红军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顺利地冲过了三道封锁线，到达了湘江附近。但由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仍把持指挥权，红军本应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彻底扭转被动局面。而他们的意图是到湘西，与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待放下行李后，再举行反攻。这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是极不现实的想法，加上他们实行“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光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就有1万多人、1000多副担子。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还携带了大批辎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坛坛罐罐”。部队行进速度缓慢。

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舍不得丢弃“坛坛罐罐”，错过了渡过湘江的良机，致使蒋介石调集军队，在湘江沿岸部署完毕。红军在突破敌人的湘江防线时，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惨痛的教训使红军指战员陷入沉思：为什么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中，同样弱小的红军能抵御数倍于己的敌人，并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却处处被

动，连遭败绩，特别是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左”倾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致。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2师5团打开了通道县城，第二天，中央领导同志举行了一次通道会议。

在会上，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那个只会在地图上指挥战斗、同敌人死打硬拼、被彭德怀斥为“鬼卖爷田心不疼”的李德，依旧不思悔改，还是坚持让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完成“大搬家”计划。

李德的建议是让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硬拼，因为这时蒋介石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在这个方向上，敌人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已经布置好了口袋，等着红军去钻。

从国民党围堵红军的兵力上看，贵州军阀的兵力最薄弱。贵州地方军队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十分低下。士兵身背二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号称“双枪兵”。

在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

当时毛泽东仍无指挥权，只是因为当时红军只能这样做，否则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军事顾问李德一贯专横跋扈，他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实际上成了凌驾于红军各级指挥员之上的“太上皇”。惨痛的教训使愈来愈多的人认清了他的策略是错误的。他的建议被拒绝之后，竟然恼羞成怒，中途退出了会场。

会后，李德找到周恩来，询问会议的决定。

一贯沉稳的周恩来有些激动起来，他说：“中央红军自出发以来，损失严重，部队疲惫不堪，亟需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薄弱，只有去那里，红军才可能得到休整。”

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建议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

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周家祠堂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1师3团的领导同志开会，向他们传达了通道会议精神，布置了夺取黎平的任务。他高兴地说：“前天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全州战斗的经验教训和确立红军的战略方针。他提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面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好仗，扭转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赞成这个主张。现在派你们团向黔东行动，在三天之内攻占黎平城。”

红3团的领导听了周恩来的传达，顿时感觉心明眼亮，他们又想起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机动灵活地打破蒋介石的四次“围剿”的事来。大家的信心更足，勇气倍增。

12月14日晨，红3团从牙屯堡出发，向黎平进军。

黎平城四面环山，敌人在这里没有修筑什么工事。守敌是黔军一个团和一些地方武装。

当红3团进抵黎平、守敌听到红军要进攻黎平的消息后，惊慌失措，不战而逃。14日下午，红3团顺利地进占了黎平。

中央红军主力也很快到达黎平。

中央红军西入贵州，占领黎平，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敌人重兵甩在了湘西。红军离开根据地之后，第一次得到了休整的可能。党中央也得以在黎平召开会议，进一步决定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

毛泽东力挽狂澜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甩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部队，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便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清算了“左”倾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他在批判“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实力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时说：“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



为这一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者打倒。”

毛泽东在指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的策略，即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箴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红军打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然而，“左”倾领导者却把这种正确的战略战术斥为“游击主义”、“右倾路线”，加以批判、否定，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用下面的一段话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起劲的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断、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

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接着又对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式“极端的恶劣”，指出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毛泽东的发言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弹，击中了“左”倾领导者的要害，赢得了与会的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但也有个别人持反对意见。当有人提议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时，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说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

在60年代，毛泽东在回忆此事时说道：“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

是的，毛泽东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力，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围剿”的。他虽

然自谦当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他所创造的游击战术，却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与发扬，是中国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兵法”。

遵义会议之后，“左”倾领导者李德、博古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他们被取消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为总书记，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负责军事工作。

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新的局面开始了！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中央大部分领导的赞同，他们起而支持毛泽东，这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王稼祥便是其中的一位。

王稼祥 1925 年献身革命，后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他与王明等人结识。1930 年，他回到祖国，1931 年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他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接触毛泽东。通过工作实践，王稼祥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均深表敬佩。他开始摆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束缚。

1932 年 10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右倾主要危险”的错误，他